

元明清云南方志中“百夷”等称谓的流变

贾 益

[提要]“百夷”或“白夷”一词作为某一地区人群的总称出现于元代史籍,明代早期成为志书定例;明代中期以后,在李元阳的推动下,“爨夷”代替“百夷”或“白夷”等称呼成为总称,其转变有着深刻的观念内涵。自明入清后,前代史志中的各种称呼既有保留,亦有变化,但“百夷”或“摆夷”等作为系统总称的含义在逐渐淡化,同样体现了时代背景的转移。随着近代“民族”话语出现,“摆夷”逐渐成为某一“民族”或“种族”的称呼。

[关键词]“百夷”;“金齿”;“爨夷”;“摆夷”;李元阳;民族观念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7)09—0043—08

作者简介:贾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副编审。北京 100081

云南历代方志所记各族名称繁复难解,一方面陈陈相因,另一方面又有所变化,读之难以获得一个较清晰的认识。而此类名称在使用方式与内涵上的延续和转移以及称谓的改易,却颇能反映中国古代“种人”分类所依据的“义例”或者说观念基础的改变。以此认识为出发点,笔者翻检元代以来方志,参考前人著述,^[1]以百夷、白夷、摆夷、爨夷等一系名称为例,梳理其流变,辨析其所反映的不同时代观念,以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一、从金齿白夷到百夷

大理为忽必烈灭后,云南地区再次纳入中央王朝管辖。不久,便有滇西地区的“金齿蛮”前来中央朝贡,带来了关于当地风土的信息。元人王恽《中堂纪事》载其经过云:中统二年(1261)辛酉夏四月十三丙午,“已刻廉右丞、张参政会王相第,呼金齿蛮使人,问其来庭之意及国俗、地理等事。言语侏离,重译而后通。国名百夷,盖群蛮之总称也。其地在大理西南数千里外而隶六诏焉……其人衣冠装束,髻发于顶,裹以絳毡,复以白叠布盘绕其首;衣以皂缁,无衿领之制,膝以前裂而编之,如悬索然。眉额间涂丹墨为饰。金其齿,盖国俗之贱者也,意思野逸,殆惊麇然?”^[1](P.371)

这是“百夷”之名首次见于史籍^[2],其含义很明确,“国名百夷,盖群蛮之总称也”。但在记述者那里,仍然记其为“金齿蛮”,并特别注意到使者“金其齿”之外貌,可见“金齿蛮”似为据风俗而称

之。金齿之俗,在中原典籍中的记载可上溯至唐代,樊绰《云南志》中有“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并在永昌、开南,杂种类也。黑齿蛮以漆漆其齿,金齿蛮以金镂片裹其齿,银齿蛮以银。有事出见人,则以此为饰,寝食则去之。”^[3](P.167)此习俗可能到元代还流行于此一地区,故赵吕甫认为“大抵金齿族最众,史志遂以金齿统称诸部。”^[3](P.168)而方国瑜则认为,金齿诸地在大理前期隶属永昌、敕化二节度,至大理后期别设为金齿镇,后来元朝所立之金齿宣抚司则因之。^[4](P.669)可见金齿又为建置名(地名)。

《元史·地理志》载金齿等处宣抚司云:“其地在大理西南,兰沧江界其东,与緬地接其西。土蛮凡八种:曰金齿,曰白夷,曰爨,曰峨昌,曰骠,曰繛,曰渠罗,曰比苏……及段氏时,白夷诸蛮渐复故地,是后金齿诸蛮浸盛。元宪宗四年,平定大理,继征白夷等蛮。中统初,金齿、白夷诸酋各遣子弟朝贡。二年,立安抚司以统之。至元八年,分金齿、白夷为东西两路安抚使。”^[5](P.1482)是则很有可能金齿、白夷(百夷)皆为滇西南比较强大的部族,大理时期势力互有消长,至元代仍保留此种格局,故有金齿宣抚司之下分金齿、白夷两路安抚使之举。因此,元代对此地区人的总称,或称“金齿”,或称“白衣”、^②“白夷(百夷)”,或称金齿白夷(百夷)。王恽所记事,即为《元史》等所记“中统初,金齿、白夷诸酋各遣子弟入朝”^[5](P.1482),其中

金齿、白夷(百夷)等称呼均为总称,不特指也。

此后,金齿百夷常常连称,有时指地名建置,有时则为当地人的总称。如《圣朝混一方輿揽胜》有“金齿百夷诸部”^{[7] (P.83)}、“金齿百夷诸路”^{[7] (P.84)};《招捕总录》有“白衣、金齿、漆头、花角”^{[8] (P.128)}。稍早成书的李京《云南志》在诸夷风俗中专叙“金齿百夷”,不过李京总结“金齿百夷”风俗时说“西南之蛮,白(百)夷最盛,北接吐蕃,南抵交趾,风俗大概相同。”^③而介绍风俗时又说:“金裹两齿,谓之金齿蛮;漆其齿者,谓之漆齿蛮”^{[9] (P.93)}云云。则大概白(百)夷更常用于种类总称,而“金齿”更常用于地名或特指具有某一风俗之人。又方国瑜梳理元代金齿白夷称谓云:

元代记录往往以金齿白夷并举,二者都称傣族,没有区别;但从多数的记载来看,好似称大泰为金齿,小泰为白夷,所以在永昌区的记载多称金齿,在车里区的记载多称白夷,有些地区大泰小泰都有,就连称金齿白夷:就一般记录来说,大概如此。但有许多是错乱的,后来用金齿名称的渐少,大都称为白夷,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云南百夷篇》说“麓川、缅甸、车里、八百媳妇等地,统谓之白夷”,以白夷为傣族的总称了。^{[6] (P.24)}

《殊域周咨录》为明万历时期作品,方国瑜所谓后来,则已是元朝之后了。实际上,早在明洪武时期钱古训、李思聪出使“缅甸、百夷”所写报告即《百夷传》中,便只称“百夷”,不再连用“金齿百夷”,而“金齿”之出现只在“金齿都元帅府”这一延续元代建置的语境中。至于习俗,亦只提到“漆齿”而无“金齿”^[10]。不过,钱古训等人对于“百夷”的含义,出现了两种解释,云“俗有大百夷、小百夷、漂人、古刺、缅人、结些、吟杜、弩人、蒲蛮、阿昌等名(以其诸夷杂处)故曰百夷(今‘百’或作‘伯’、‘𣎵’,皆非也)。”^④似乎“百夷”是因种类之多而称之,类如上述王恽所说“群蛮之总称也”。但在具体种属中又有“大百夷”、“小百夷”之称,并云“诸夷言语习俗虽异,然由大百夷为君长,故各或效其所为。”^{[10] (P.105)}因此“百夷”之为总称,亦可能因为“大百夷”或“百夷”为君长故也。^⑤如前所述,百夷很有可能为白夷(白衣)之异写,“百”字取义为“多”、“杂”,可能是王恽、李思聪等记录者据发音而引申。但无论如何,“金齿”以习俗名之,“白衣”以服色名之,与“百夷”一样,皆为他称,只不过“百夷”之称,更便于解释中原士人对滇

西地区人群“群蛮杂处”的印象。

受《百夷传》影响,明代早期诸书,似乎以“百夷”之称为多。永乐年间设四夷馆便有“百夷馆”;^⑥张洪《南夷书》载“大理之北为珥海卫,西为景东卫、蒙化卫,西南为金齿卫,皆当百夷之冲。时百夷未归戢方,故特为之备焉”,又有“百夷王思伦法”云云。^[13]《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腾冲军民指挥使司·外夷衙门》记各土司族属为木邦军民宣慰使司:金齿蛮、黑齿蛮、绣面蛮、花脚蛮;缅甸军民宣慰使司:缅甸人;孟养军民宣慰使司:百夷;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百夷;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百夷;老挝军民宣慰使司:百夷;孟定府:百夷;孟良府;干崖宣抚司:百夷;南甸宣抚司:百夷;陇川宣抚司:百夷;镇康州:百夷;湾甸州:百夷;大候州:蒲蛮;威远州;芒市长官司:钮兀长官司:倭泥。^{[14] (P.118-121)}《土官底簿》有“元江军民府知府那直,百夷人”^{[15] (P.381)}。《正德云南志》卷四十一《外志·诸夷传六·本朝》之“百夷”条则录《百夷传》,总称百夷,亦有“大百夷”、“小百夷”之说。^{[16] (P.769-780)}

可见此时的“百夷”已经成为大理、永昌西南一大片地域和族群的总称,因族而称其国,因国而称其地;其作为族群或者“种人”之内涵,则主要是指所谓的“大百夷”。又因中原士人解释百蛮杂处之潜意识,“百夷”二字脱离原来“白衣”、“白夷”之同音异写,成为“正字”。因以“百”为正,所以才出现“𣎵”、“伯”等错写之字,即前引李思聪《百夷传》所说“今‘百’或作‘伯’、‘𣎵’,皆非也。”实则“百”之正写地位,也只是明初以来才成立的。

二、李元阳改“百”为“𣎵”之意

“百夷”写作“伯夷”,元代已有,如周致中《异域志》有“伯夷国,其国近云南,风俗与占城同,人皆以墨刺其腿为号,养象如中国养羊马”云云,“伯夷”为“白夷”之误也。^{[17] (P.28)}“𣎵”之称古已有之,然“𣎵夷”指滇西民族,则明初方有之。^{[6] (P.24)}如《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五云:洪武二十二年(1389)三月戊戌,“南安侯余通源卒……十六年命守云南,二十一年征𣎵夷,八月召还京师,至是以疾卒”,然“𣎵夷”在明前期亦只为偶见。直到万历年间李元阳撰万历《云南通志》,“𣎵夷”经过重新解释,才取代了“百夷”之正写地位。对此,方国瑜有详细考证,其结论是:

明代前期记录,亦用𣎵字称白族,今存《景泰

云南志》、《明一统志》、《正德云南志》、《土官底簿》及嘉靖以前著作,所见僂字最多,可资考校。到《万历云南通志》改称白夷为僂夷,取《正德云南志》来对校就很明白:凡《正德志》的白夷,《万历志》改作“僂夷”,^[6]又《正德志》的“僂人”,《万历志》改作“郡人”或“白人”,这显然是纂修《万历志》的李元阳有意改写的。^{[6] (P. 24-25)}

正如方国瑜所言,李元阳改“百夷”为“僂夷”确是有意为之,那么其意究竟为何呢?

万历《云南通志》羁縻志僂夷风俗条中说“僂夷在黑水之外,即今之所谓百夷也,僂、百声相近,盖音讹也,性耐暑热,所居多在卑湿生棘之地,故造字从棘从人。”^{[18] (P. 371)}似乎是二字孰为正写的问题。然正如前人所发现,“僂”在明代以前史书中所见不少,大多是指分布于滇中至大理一带的人群,^{[6] (P. 24)}似未见如此解者。又说文曰僂为“犍为蛮夷也。从人,棘声”^{[19] (P. 383-384)}，“棘”实取其声,解为“卑湿生棘之地”,于古亦无据。李元阳进士出身,中年以后又留心经史,似不应据此牵强证据,唐突改“百夷”为“僂夷”。其中缘由,还在于李元阳认为明代以来云南的华夷之界以及诸夷分布已经与前代完全不同。举《正德云南志》与万历《云南通志》云南府、大理府风俗条对比便可知一二。

《正德云南志》云南府风俗条第一条便是“种类非一,习俗不同”,并引李京《云南志》列举“诸夷”名称十余种。^{[20] (P. 129)}大理府风俗条则云其地“俗本于汉”,并引郭松年《大理行记》曰“大理之民,数百年之间五姓固守,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然其规模、眼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人。本朝百余年来文教浹洽,风俗渐与中州同矣,然其尚浮屠,贵食生,并星回节等俗,尤仍其旧。”^{[16] (P. 171)}无论是“种类非一、习俗不同”还是“俗本于汉”,描绘的仍然是一幅“夷汉杂处”、“夷”风处处可见的景象。

但《正德云南志》所述并非明代中期实情,只是引用元代李京等人的描述,实际上是元代的情况。故李元阳在《云南通志·羁縻志》序中特意指出“元儒李京景山传夷方风俗之陋,以今观之,绝不相类,乃知秉彝恒性,无间华夷,顾王化远迹何如也。”^{[18] (P. 371)}二志修志时间间隔六十余年,一以元代风俗系于当代,一则以为与元代风俗“绝不相

类”这一方面是后者资料更多来自当代,另一方面也代表写作者华夷观念的不同。在李元阳笔下,云南府和大理府已经差不多是同于内地的景象了:云南府“人禀名山大泽之气,子弟多颖秀,科第显盛,民遵礼教、畏法度,士大夫能尚节义。盖由土住者少,宦戎多大江东南人……至于山菁所居,名为此间土人。种类非一,言语杂夷,尤守信约,敦朴素,邻保相资葬,祭从土俗,较胜国以前之习,大不侔矣。惟有疾信巫祝、不服药,遽不可变也”^{[18] (P. 42)};而大理府则“高山大川,钟灵毓秀,代有人才(僂绰《云南志》);俗本于汉,民多土类(郭松年《大理行记》);书有晋人笔意(元李景山志);科第显盛,士尚气节”^{[18] (P. 52)}

《正德云南志》关于大理风俗又有一条“民多土类”云“郡中汉、僂人少工商而多土类,悦习经史,隆重师友,开科之年,举子恒胜他郡,其登黄甲,跻华要者,今相属焉。”^{[16] (P. 171)}此应为明代大理实况。可见正德以前,大理当地的土子中,汉人和僂人皆有。而此处特别点明族别,说明大理地区的僂人虽然有相当高的文化,与汉人一样都能入士林、登科第,但汉、僂之分仍然明显。万历《云南通志》修纂者李元阳正是这些大理土子之一。至于其出身,今日常被谓为白族,其行传则云“讳元阳,字仁甫,世居点苍山十八溪之中,因号中溪。其先浙之钱塘人。祖讳顺者,仕元为大理路主事,爱恋山水,遂家焉。”^{[21] (P. 489)}无论如何,李家世居大理,相对明初以来迁入之汉人,被视为土著甚至僂人,也是大有可能的。然而,李元阳之生平交往、学术文章,无一不是典型的儒家士大夫所为。因此,从李元阳个人观感的角度来看,大理地区早就无分“汉、僂”了。

李元阳修万历《云南通志》强调的是明代之大一统与华夷无间。^{[22] (P. 246-261)}而大一统的根基,即在于自两汉以来,云南便渐染华风了,“文约之所渐被,声教之所周流,其来久矣”。虽然唐代天宝以后,“边吏无良,群夷忿怨,始有割据之祸”,此后数百年隔为异域,“土生斯时,能不左衽者寡矣”,但至本朝“皇明我高皇帝恢复华夏,奠正区宇,置云南郡县,视两汉有加焉。”^{[18] (P. 3)}其大一统,乃是华夏中心之大一统;华夷无间,则是声教渐被,“夷”同于“华”之结果。所谓“大一统”,仅仅是疆土归入一统是不够的,例如元世祖“未定中原,先取南诏,然因陋守旧,建立无关焉”,只有明太祖

“复三皇五帝之境土,施三皇五帝之教化,不四三年,云南衣冠文物,济济乎与中土相掎”^{[18] (P.34)}。因此,李元阳划分“华夷”种类的重要标准便是接受教化之程度。

在《正德云南志》中谈到“僰人”,大多出现“汉僰同风”的表述。如楚雄之萨摩人“近年以来稍变其故俗,而衣服饮食亦同汉、僰,更慕诗书,多遣子入学,今亦有中科第者”^{[20] (P.250)};蒙化府“边城居者多汉、僰人,男女勤于耕织,会饮序齿而坐。婚姻必察性行,皆非前代之故习矣,盖自开设学校以来,闻礼义之教,且近于大理,其亦有所渐染者欤”^{[20] (P.301)};广西府“惟僰人类华人,稍知礼义法度,而谲诈则又过于诸夷”^{[20] (P.341)};曲靖府“郡中亦夷汉杂处,列屋于府卫州县之近者,大抵多汉、僰”^{[20] (P.385)};姚安府“僰与汉同风”^{[20] (P.409)};鹤庆府“凡近州治而居者多汉、僰人,稍知向学,而其习俗与山后人及罗罗、麽麽不同”^{[20] (P.429)};金齿司“境土人有三种,曰僰人,曰阿昌,曰蒲蛮。僰人与汉人同风……”^{[20] (P.545)}。如果以接受教化的程度为标准,既然在实际上和修志者的观念中,明代中期以来汉、僰便已“同风”,则更进一步地区分二者也无必要了。可能正是持此理由,前志当中大量出现的“僰人”才在李元阳所修万历《云南通志》中几乎完全消失了。

此外,嘉靖以来,地方志当中关于云南历史叙述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在《正德云南志》中,云南历史自庄躡入滇开始,南诏、大理历史以“开元以后至宋俱为蒙氏段氏所据”一笔带过;而到了万历《云南通志》,云南历史被上推至三代(《周书》中的百濮),南诏、大理世系建置亦得编入,还包括了“白子国”的史事。关于“白子国”,史云汉武帝时,“白崖有天竺白饭王之后名仁果者称白王,为众所戴,天子册为滇王,仍治白崖,躡世乃绝,白人之名始此”^{[18] (P.33)},其后又建大白子国。这些变化,很大程度是明代中期以后,《白古通记》等大理本地知识分子所写南诏大理史事逐渐进入地方史志的结果,实乃本地旧族“心史”,包含了“华夷”平等之观念。^[23]元明文献中所说的“僰人”一名受到李京的较大影响,其称“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属县是也。故中庆、威楚、大理、永昌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9] (P.86)}此“白人”即为“僰人”之转。但由于“白人”和“白子国”历史的重建,“白人”不再是“僰人”之后世

音转,而成为古已有之的自称。这种观点对明代中期以后的地方史志颇有影响,《滇志》载“白人,古白国之支流也。旧讹僰为‘白’,遂称其一类,实不相通。滇郡及迤西诸郡,强半有之。习俗与华人不甚远,上者能读书,其他力田务本,或服役公府,庶几一变至道者矣。”^{[24] (P.998)}是以“僰”为“白”之讹了。

此外,李元阳还以《尚书》所载“黑水”的考订,对云南的华夷之界做出了新的界定。他认为:“澜沧江在《禹贡》为黑水,《书》:华阳黑水惟梁州。言华山之南黑水之北为梁州也。”^{[18] (P.20)}他考证黑水为今澜沧江,是为了说明云南郡县属《尚书·禹贡》所载之梁州(因黑水为梁州之南界),也即将云南澜沧江以北纳入古九州之域,是云南为大一统之内华夏旧属的证明。其中,华夷之分界成为他重要的证据,黑水为潞江之说因“内外皆夷”而“于梁州之境,若不相属”^{[25] (P.186)};反过来,澜沧江“今水内皆为汉人,水外多属夷缅”则可判定“《禹贡》所分梁州界者,惟澜沧江”^{[18] (P.20)}。因此,澜沧江成为华夷分界,既然华夷之界被推到了澜沧江一线,且自古至今皆如此,则自秦汉以来便被目为西南夷之重要一种的“僰”,便从指四川以西以南之人,自然被改成了指澜沧江以西以南之人。此种地理上的认识,可能也是明代对云南夷汉地理分界的一般看法,毛奇龄总结为“入明南征,竟版籍其地,辟菁落而加以经画……创制云南、楚雄、临安、大理诸府为内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车里诸地为西南夷,一如旧时成都之视滇池。”^{[26] (P.188)}

总之,李元阳改“百夷”为“僰夷”之意,是对明代云南华夷之界的重新认定以及“汉白同风”、“白人”非“僰人”而是“于种人最慧”且“贵以王裔”之观察与体认。他做这种改变的后果,使得元代李京所述云南三个基本的人种分类:僰、爨、金齿百夷,一变而为两大种类:爨与僰;但“僰”之所指,却经过对“僰”的重新解释而完全不同。实际上,由于“僰夷”与习称之“百夷”混同,使得李京笔下的“僰人”之称基本从以后的地方志文献中消失了,或等于“僰夷”。就指称而言,“僰夷”尽管未能完全取代“百夷”的称呼,但以“居卑湿生棘”之地的“僰”来解释“僰夷”的由来,却似乎更为此后的方志撰写者所接受,取代了对“百夷”之“百”为“百夷杂处”的解释。例如万历年间沈德符撰《万

历野获编》载“百夷即僂夷,以音相近,讹称。”^{[27] [P.926]}天启年间谢肇淛作《滇略》云“僂夷,在迤西黑水之外,即百夷也,好居卑湿棘刺之地,故从棘、从人。”^{[28] [P.777]}刘文征《滇志》云“僂夷,种在黑水之外,今称百夷。盖声相近而讹也。性耐暑热,居多卑湿棘下,故从棘从人。”^{[24] [P.996]}由以从“百夷”为正字到以“僂夷”为正字,其依据都来自对字义之解释,而“僂”之解释,至少在形式上可以追溯到先秦经典。这体现出明清士人对其他种人命名的一个重要规则:以字求解,于古求据。

三、“百夷杂处”观念下的记述

另一方面,李元阳希望以爨、僂两大系统来概括云南种人的做法,却并未得到普遍认可,刘文征更指其“然夷繁有徒,彙括未尽,又古今变殊,有名实刺谬,未免牵合附会者”^{[24] [P.994]}。故万历《云南通志》以后述云南种人之分布和种类,不尽以黑水区分爨、僂二种,如《滇略》称黑水之内的剑川、大理、姚安有“僂夷”、“僂”和“黑齿百夷”^{[28] [P.781]};《滇志》所述爨蛮中,便有分布于黑水之外永昌府属于“爨蛮”的“妙罗罗”;黑水之内江川、路南、剑川等地虽有僂夷,但不再在“僂夷”条下列举蒲人、峨昌、缥人、遮些等,而是将其单列条目叙述。^{[24] [P.996-997]}就对“僂夷”的分类而言,天启年间的两部志书中,自《百夷传》以来“大百夷”、“小百夷”之分逐渐坐实。自《百夷传》至万历《云南通志》诸书,虽有“大百夷”之名,但往往只列其名,以“百夷”或“僂夷”风俗统之,只对“小百夷”风俗单列书写。《万历野获编》载“小百夷为熟夷,在永昌府西南,大百夷在陇川之西。”^{[27] [P.925]}尽管在谢肇淛的《滇略》中以“僂夷”统称原《百夷传》中所述诸夷,但对“大伯夷”和“小伯夷”则单列详述其风俗,云:

小伯夷,熟夷也,永昌西南,环境皆是。男妇服饰稍近中华,亦通汉语,居村寨,性驯谨,耕食织衣,种类不甚繁,无长幼礼。其人体貌颇清秀,而语言缺舌。

大伯夷,在陇川以西,男子剪发纹身,妇人跣足染齿,以色布裹其首,饮食简而颇精。居喜近水,男女皆袒浴于河,妇女惟紧护两乳,谓乳非父母所生,乃天地所赐,不宜人见也。男逸女劳,纺绩、负担不辍。其人强壮者寡,柔弱多。^{[28] [P.778]}

《滇志·羁縻志》中“僂夷”一条虽无“大伯夷”、“小伯夷”之分,但在《补羁縻》之永昌外夷条

考证《唐书》所载“金齿、银齿、漆齿”说时说“今芒市长官司大伯夷以榴皮及药染齿使黑,初无金银缕饰及寝食脱去之说”^{[24] [P.1085]},又指《永昌郡传》、《广志》、《九洲记》等所记外夷风俗“皆谬妄不经”因“永、腾徼外至僂夷尽境,耳目睹记,所绝无也”^{[24] [P.1085]}。永、腾徼外为僂夷之地,是为总称,大伯夷则专指芒市长官司地之人,而对于“小伯夷”的叙述方式,也与之前志书述“小百夷”不尽相同,似乎在地理和风俗上拉近了与“大伯夷”的距离。^⑧可见至少在明代万历天启间,尽管沿袭了僂夷有大、小之分的说法,但其叙述体系已经有所不同,“大伯夷”不再等同于“僂夷”,而是与“小伯夷”并列叙之。在此种叙述中,《百夷传》所言“百夷”之另外一个含义(即西南诸夷以“百夷”为长,故以其总称诸种夷人),也逐渐消失。这可能是明代中期平麓川之乱后,“百夷”在整体上已经不再成为威胁,故在方志中以“百夷”为长之“百夷国”的历史记忆逐渐消失,而代之以羁縻制度下的“百夷杂处”和不成系统的单独描述。

清前期云南方志中的百夷描述,与天启年间无大的差别,只是依当时惯例,将“僂夷”写作“僂彝”。^⑨至雍正年间鄂尔泰等修《云南通志》中,出现了“摆夷”之称,云“僂夷,一名摆夷,又称百夷,盖声近而譌也。”^{[30] [P.238]}又鄂尔泰《恩乐县歌》中云恩乐县(雍正五年以者乐甸长官司改置)种人云:“汉人不及夷人多,分为五种别其族。一种摆夷刀姓繁,性喜凭高居重屋。”^{[30] [P.685]}其余则同于天启《滇志》。光绪重刻乾隆《腾越州志》解释摆夷来历也说“僂即摆,北人呼为摆,故误也。”^{[31] [P.161]}可见摆夷之称,大概就是音变。

至乾隆年间,以《皇清职贡图》的绘制为契机,各省州府县对所属种人做了重新梳理,因有不少实地资料,从而形成了与此前相异的认识。关于“僂夷”,《滇省夷人图说》载“僂夷,亦名摆依,又名百彝,俗淳,重祀礼,耐暑热,就卑湿处,支木作楼居,下裸牛马,釜甑用瓦,捕鼠或虾蟆以待客。云南府及他郡州皆有之”^{[32] [P.7]};又有“水百彝,力柔性懦,筑土室,水边居,习于水也,种槟榔,务耕织,开化府有之”^{[32] [P.3]};“旱百彝,山居,性勤,男子衣及膝,女高髻帕首,缀以五色丝,裳亦然,开化府及普洱有之”^{[32] [P.39]};“花百彝,性柔嗜嗜辛酸,居临水以渔稼,每岁三月男妇击鼓采花堆沙献佛以迓吉祥,普洱府属有之。”^{[32] [P.92]}《皇清职贡图》

则记曲靖等府僂夷称“僂夷一名摆夷,汉为叵箝,唐为步雄嶠峨二部,元初内附。其部落接壤缅甸车里,今云南曲靖、临安、武定、广南、元江、开化、镇沅、普洱、大理、楚雄、姚安、永北、丽江、景东十五府皆有之,随各属土流兼辖,与齐民杂处。”^[33] (P.15) 清刻本《南诏野史》云“僂人,一名百夷,又名摆夷,性耐暑热,居多在棘下。本澜沧江外夷人,有水旱二种:水僂夷近水好浴,薙后发,蓄前发,盘髻如瓢,故又名瓢头僂夷。旱僂夷山居耕猎,又名汉僂夷。男青布裹头簪花,妇女不施脂粉,自然白皙,盘发辫,红采包头,饰以五彩线须,衣五色桶裙,绣其边。其俗贱女贵男,头目妻数百人,庶民亦数十,耕织贸易皆妇人任之。凡婚娶,男女相悦而议聘,一成匹配,不肃而严,如夫妻不睦,听夫付之一物为凭,然后改适。有邪术,能使男子千里不忘,其法不外传也。”^[34] (P.38) 《南诏野史》初为明代万历年间倪辂所集,后清人胡蔚于乾隆四十年增刻,假托杨慎,其实所做增益甚多,^[35] (P.28) 其“南诏各种蛮夷”,不见于明代诸书,而多见于《皇清职贡图》、《伯麟图说》等,当为胡蔚增益部分。故上引文字,反映的恰好是清代中期人们对滇西“百夷”的认识。

此种认识,颇不同于明代后期以来至清初诸书,其要点可概举如次:其一,继续以“僂夷”居于湿热“棘下”之地,解“僂”为“从人从棘”,而且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挥,使其更为于古有据。如道光《云南通志》引《新兴州志》以《周礼·王制》“屏之远方,西曰僂(僂,偏也,使之偏寄于荒远)”来解释“僂”。^⑩其二,在“僂夷”之外其他名称的列举中,除百夷、白夷等之外,又都加上了“摆夷”一名。大概自清康熙以来,“摆夷”逐渐取代了“百夷”,成为“僂夷”之俗称^⑪或“今称”。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录《百夷传》所谓“百夷即麓川平缅宣慰司(案百夷即今摆夷,译语对音,故无定字)。”^[37] (P.678) 其三,摆夷内分水、旱二种之说,不见于前书,亦为新出。

至阮元等于道光年间修《云南通志》,上述新的认识也被吸收进去。而自元代以来关于“百夷”的知识,则被分在“僂夷”、“旱摆夷”、“水摆夷”、“花摆夷”、“伯彝”、“哀牢夷”等条目下分别叙之,^[38]如“僂夷”一条内容源自《皇朝职贡图》、旧(乾隆)《云南通志》、《伯麟图说》及各州府县志,“又名摆夷”出自《皇朝职贡图》,“又名百夷”出自旧《云南通志》,故大略以清代早期志书中所称之

“僂夷”为条目,下系各书以“僂夷”、“百夷”、“摆夷”名之者。“旱摆夷”、“花摆夷”仅录《伯麟图说》,“水摆夷”录《开化府志》、《宁洱县采访》、《伯麟图说》,应为雍正乾隆时期的认识。“伯彝”所记则有各府州县志书中称伯彝、伯夷者,又引《腾越州志》叙小伯夷、大伯夷,但此条中有称“摆衣”、“白夷”(引《弥勒州志》)及“百夷”(引杨升庵《滇载记》)者,不知为何单独列条,但其内容,大部分应是沿袭明代以来的记录。而“哀牢夷”条引《后汉书》,又据《峒溪纤志》叙金齿、漆齿、绣面等名。漆齿之俗,在“僂夷”条中多所见,然不见以此条考之。以今日眼光来看,“哀牢夷”、“僂夷”二条恰为古今之异,此种体例未免混乱。然回归当日观念,《峒溪纤志》被认为是当时人记当代事,是则道光志中的僂夷、哀牢夷,大略还应为种类之分,而非古今各置。总之,在道光《云南通志》的种人记述中,虽引证广博,条目分列却较为随意。之所以如此,除志书“广所未备”、“考古稽逸”的旨趣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雍正朝改土归流之后,景东、镇沅、元江等地已成郡县,当时所认知者,如水摆夷、旱摆夷、花摆夷等,多分布在此区域中,其相关记载还未能与历史上所认知的“僂夷”、“百夷”等相接续。而且在当时背景下,“黑水之外”的“百夷”不像明代那样,被看成为一个整体的滇西祸乱之源或“他者”存在,故亦无对其种人记载作系统梳理之动力。

同时期谢圣纶编撰《滇黔志略》所记,则有“金齿蛮”、“僂夷(一名摆夷)”、“摆彝人”、“五郎沟彝人”等称呼,并谓“其僂、罗二种详见前数条者,盖本于《百蛮图说》,《图说》又本于《滇志》诸书,其考据致为详晰。”^[39] (P.179) 可见在道光年间,虽出现大量关于西南夷人之图说,但不少图说仍然受到前代认识的重要影响。只不过此时期,对“僂”之描述,已经不同于明代所称“黑水之外”作为整体的“百夷”集团,而是表述为“散居各郡”、“所属皆有”的状态。^[39] (P.177)

结语

元代征服大理,将云南纳入行省之后,建立了土司制度,明代虽三征麓川,巩固了其统治,但滇西大片地区,仍基本维持土司的治理。相应地,在元代到明中期的记载中,形成了以《百夷传》为母本的“种人”记叙系统,“百夷”成为这一地区“种人”的主要描写对象,其余诸种,大都被理解为“百

夷”之属部,或者以“百夷”总括“杂处”之诸夷。明中期以后,方志中云南归于大一统王朝的历史叙述逐渐成熟,在大理本地文人李元阳的精心设下,原来指代云南、大理等府与汉人杂居的“僂人”之“僂”被重新解释,成为黑水(澜沧江)以外“百夷”的称呼,并以爨、僂的不同分布和治理特点,构成“华”与“夷”、郡县与土司的边界。此后,爨、僂二系的“种人”系统以及以黑水为界之“华夷”分界,一直颇有影响。

雍正年间在西南施行改土归流以及乾隆年间关于内夷、外夷界限的重新划定,使得方志记载中的滇西土司脱离“羁縻土酋”的定位,进入朝廷“秩官”之例,原来区分华夷的僂、爨二种系统,也完全被打破。在编修《皇清职贡图》的推动下,出于考古稽逸的兴趣,以及“昭王会之盛”的需要,方志中记述的“种人”类型大大增加。这些增加的种类,不仅是各州府县为编修职贡图描画上报者,而且有些仅见于旧志记载的名称和风俗实际上可能已经不存在的也被一一记录在册。这其实是清代中期以后,“华夷之辨”之“夷”逐渐转向“外夷”的反映:对于包举于疆土之内的“内夷”,其管理、种类分辨等更多地属于地方事务,故对于夷人之种类则缺少将其进行系统整理的动力。

进入晚清,杨发锐在《东方杂志》发表《腾越人种考》,虽接续明人之种人分类,但在明人“僂夷”一类之外,又增加清代中期以后才出现的“摆夷”,并谓“凡各土司地方,不论官民皆统呼之曰摆夷”,可见到了清末,“摆夷”已经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称呼。而杨发锐将部分土司作为“纯粹”的汉人与“摆夷”进行区分,又说明“实在摆夷”之居地、风俗、人口等,^[40]正是一种近代观念下的区分与描述,即试图将某一人群在血缘、文化、地域统合的基础上区分为“民族”或“种族”。当他做这种区分和重构时,“摆夷”便由方志中常见的“种人”称谓,渐渐转变为近代“种族”或“民族”的名称了。

注释:

①前人对百夷、白夷、摆夷、僂夷一系名称的研究,一般都纳入傣族族称追溯范畴,为免先入之见,我将这一系名称仅作为记载中的名词看待,不深究其所对应人群,但对相关成果中名词考证部分,仍会在涉及具体问题时充分考虑。

②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谓“元代记录所见‘白衣’名称甚伙……白衣的名称,盖由于服色……元代称傣族为白夷,见于记录者最伙,与白衣的称谓并无区别;疑原称白衣,以为

族名,改作白夷。”

③古永继认为原文之“白夷最盛”之“白夷”当为“百夷”;而江应樑则认为,宋以来有“白衣”之称,“惟元代中年以后,‘白衣’一名已不常用,通作‘白夷’或‘百夷’”。

④括号中文字钱古训本无而李思聪本有。

⑤胡绍华认为,元以来,“百夷”一名常用作地名(国名)和地区民族总称;同时,自《百夷传》成书之后,由于“百夷”与专指傣族的“白夷”音同,故二者有所混淆。此外,由于“元末明初傣族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有了较大的发展……成为这一地区主要的和先进的民族,别的少数民族则受之制约,故民族总称的‘百夷’就变成成为傣族专称了”,即认为“百夷”之称与“白夷(白衣)”之称是两个系统。实际上,元代“百夷”之称以及《百夷传》中之“百夷”,亦有特指某一族之意,实从白夷(白衣)转变而来,但其认为“百夷”既为各族总称,又为各族君长(先进民族)之称,则是。

⑥《四夷馆考》称“其种类最繁,故以百称。”又,《四夷馆考》记干崖“白夷居之”,陇川“皆白夷所居地”,大侯“白夷所居地”。似乎“白夷”为特指三地属于“百夷”之另一种类。

⑦万历《云南通志》中亦有“百夷”的用法,如元江军民府因远罗必甸长官司风俗云“境内皆百夷,性懦气柔,不敢逞恶,惟酋长所使。”景东府风俗条云“学校声教渐迁,其俗民多百夷,性本驯朴,旧田种秫,今皆禾稻,昔为緬字,今有书史。”大侯洲风俗条云:“民有二种,百夷之俗同于湾甸,蒲蛮之俗同于顺宁。”未能尽改,则明其乃有意改之而有遗漏矣。

⑧《百夷传》称“小百夷居其境之东北边,或学阿昌,或学蒲蛮,或仿大百夷,其习俗不一”。《正德云南志》则称“小百夷风俗颇通蒲人”。可资比较。

⑨又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四译馆考》抄录明代《四夷馆考》,为避“夷”之讳将“百夷”改为“百译”,又将原来写作“白夷”的几处改为“僂”、“僂蛮”或“白蛮”。亦为当时改“夷”字之例。

⑩晚清文廷式考证僂字云“《王制》: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郑注:棘当作僂,僂之言偏,使之偏寄于夷戎,不屏于南北,为其大远。孔疏曰:僂之言偏者。按《汉书》西南有僂夷,知非彼夷,而读为偏者,以与寄文相对。寄非东方夷名,是寄旅之意,则僂亦非西方夷名,以为偏迫于夷狄也。愚按若取偏寄之义,则东方亦可云偏,西方亦可言寄,且既已屏之远方,岂有不定所至之理。棘当为僂,必指僂夷而言。郑既破字,可无疑义。惟东方之寄,郑未能实指,故其词尚游移。窃谓寄犹寓也《曲礼·大夫》:寓祭器于大夫。郑注:寓,寄也《禹贡》:岷夷既略。岷夷即东夷。东方曰寄者,盖即屏之岷夷,而名之曰寓,犹之屏诸僂夷而名之曰棘也。棘从僂得名,不必破作僂;寄为寓借字,亦不必改作寓。”则更为肯定了古代儒家经典纪述与“僂夷”的关系。而此问题之脉络,则可追溯到明代。

⑪道光《云南通志》引《弥勒州志》云“元江一种,薙头,俗呼摆衣,即白夷也”。

参考文献:

[1] (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41-100)[A]//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二)[Z].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

[2]杜杉.傣族史称“百夷”始于何时[J].中国民族,1962(10).

- [3] (唐)樊绰. 云南志校释[M]. 赵吕甫校释.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4] 方国瑜.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5] (明)宋濂撰. 元史·地理志四(卷61)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6] 方国瑜主编. 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 [Z].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 [7] 圣朝混一方輿揽胜[Z].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编(101)影印明刻本.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8.
- [8] 招捕总录[Z]. 中国野史集成(12)影印守山阁丛书. 成都: 巴蜀书社, 1993.
- [9] (元)郭松年(元)李京撰. 大理行记校注云南志略辑校[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6.
- [10] (明)钱古训. 百夷传校注[M]. 江应樑校注.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0.
- [11] 胡绍华. 试述“百夷”含义的历史演变[J].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4(3).
- [12] (明)王宗载. 四夷馆考[Z].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第2册)影印1908年东方学会印本.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
- [13] 王叔武. 《南夷书》笺注并考异[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1(3).
- [14] (明)陈文等纂修.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十卷[Z]. 续修四库全书六八一史部地理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15] 土官底簿[Z].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590).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6] (明)周季凤纂修. 正德云南志(下册) [Z]. 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71). 上海: 上海书店, 1990.
- [17] 周致中. 陆峻岭校注. 异域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8] (明)李中溪纂修. 云南通志[M]. 西南稀见方志文献(21)据民国二十三年重印本影印.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3.
- [19] (汉)许慎. 说文解字注[M]. (清)段玉裁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20] (明)周季凤纂修. 正德云南志(上册) [Z]. 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70). 上海: 上海书店, 1990.
- [21] (明)李元阳. 中溪家传汇稿十卷(李中溪全集) 首一卷[Z]. 丛书集成续编(142).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8.
- [22] 郑志惠. 天下一统无间华夷: 从万历《云南通志》看李元阳的民族观[A]//云南大学历史系. 史学论丛(第五辑) [C].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3.
- [23] 侯冲. 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
- [24] (明)刘文征. 滇志[M]. 古永继标点.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1.
- [25] (明)李元阳. 李元阳集(散文卷)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8.
- [26] (清)毛奇龄. 蛮司合志[Z].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第2册)影印光绪十六年徐氏铸学斋重刊本.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
- [27] (明)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补遗卷4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28] 方国瑜主编. 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 [29] (清)江繁. 四译馆考(卷5) [Z].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编(59)影印本.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8.
- [30] (清)靖道谟纂. 鄂尔泰等修. 云南通志[Z].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570).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31] (清)屠述濂纂修. 腾越州志[Z]. 中国方志丛书(云南省16)据光绪二十三年重刊乾隆五十五年本.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7.
- [32] 揣振宇主编. 滇省夷人图说[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33] 乾隆敕绘. 皇清职贡图(卷7) [Z]. 嘉庆十年增修内府刊本.
- [34] (明)倪辂辑(清)胡蔚增订. 南诏野史[Z].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第82册)影印清刻本.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
- [35] 方国瑜. 纂录南诏大理史事诸书概说(下) [J]. 思想战线, 1981(5).
- [36] (清)文廷式. 纯常子枝语[Z].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四辑.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4.
- [37] (清)永瑢等撰. 四库全书总目[Z].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38] (清)阮元等. 云南通志稿·史部地理类存目七(卷78) [Z]. 道光十五年刻本.
- [39] (清)谢圣纶辑. 滇黔志略点校[M]. 古永继点校.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
- [40] 杨发锐. 腾越人种考[J]. 东方杂志, 1907(5).

收稿日期 2017-04-26 责任编辑 李克建